

东北师大社会科学丛书第八辑

中国古典文学论集

东北师大学报编辑部编

目 录

孟子的文学思想·····	谷云义	1
师心遣论·····	许玉琢	18
关于《水浒传》思想内容的几个问题·····	刘孝严	34
《李逵负荆》论析·····	张人和	57
论《荡寇志》·····	刘兴汉	75
曹雪芹与石头·····	丁 冰	96
谈词举隅·····	谢宇秋	116
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汪玢玲	14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外编·····	苏 兴 辑编	186

孟子的文学思想

谷云义

孟子作为我国战国时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在我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乃至文学批评史上，都有他的地位和影响。他在文学方面提出的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已经引起古代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视。这些情况，学术界未有异议。

但是，对于孟子的文学思想，或者对于孟子表述的一些文学观点，应当作出怎样的评价，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而且评价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孟子文学思想总的评价偏低；而对其中某些具体观点的评价又有偏高的倾向。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讨论。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出现的一个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的代表者，他自然要继承孔子的一些思想。然而，当我们考察他的文学观点，特别是其中一些重要看法时，就会发现他并不是简单地继承或重述孔子的某些东西，而是有他自己的见地。孟子就是以此丰富了先秦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探讨他在这个方面的贡献，是我们对孟子文学思想的评价发生兴趣的一个原因；同时，探讨他的这个方面的看法，也同探讨孔子和其他诸子这个方面的看法一样，都将有助于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早期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规律。这是我们对孟子文学思想的评价发生兴趣的又一个原因。

鉴于这样的情况，本文试图就孟子关于诗的社会功用，关于诗的思想如何理解、关于语言运用等方面的看法，以及孟子文学思想的特点等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孟子没有象孔子那样直接地来谈诗的社会功用。但是，我们从孟子有关的谈话中，却可以了解到他对诗的功用的认识。如他在谈到国君应该趁着“国家闲暇”，“明其政刑”，加强治理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只注篇名）孟子在这里引用了孔子说的话，说孔子认为，做这首诗的人，是很懂得道理的，并认为，诸侯能治理好国家，就谁也不敢侮辱他。孟子以此表达自己劝说诸侯实行“仁政”，加强国家治理的看法。孔子是不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姑且不去管它。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孟子这里引用的《诗经·鸛鸣》一诗的诗句本身所表述的内容，并没有孟子所说的那样的思想。《鸛鸣》其实是一首寓言诗。诗中写出一个被鸛抓走小鸟的母鸟，述说自己筑巢的辛勤、极度地疲劳和危殆的情景，表现了一种悲愤、不平和恐惧的思想感情，实际上反映了人民对暴虐的统治者愤恨的情绪。而孟子断章取义，把诗中的那几句本来是讲，趁着天还未下雨，赶快剥取桑根的桑皮，把巢缠得紧紧的，不怕树下的人破坏的意思，附会成对国家要加强治理的意见，并

且引用了孔子的话来做证。这里显然反映出孔门说诗的特点。不过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出孟子对诗的社会功用的看法。在他看来，诗的作者是要通过诗来表明道理，使人受到教育的。或者说，诗就是被用来实行教育的材料。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他在这里说《诗》三百中寓含着的褒贬善恶的大义，孔子认为他在《春秋》上已经借用了。可见孟子对《诗》三百寓含褒贬善恶的认识同孔子一样都是十分明确的（这个看法应做如何评价，是另一回事）。正因为如此，孟子便很注意引用诗句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查《孟子》一书，记载孟子进行有关仁政、孝道、礼义修养和性善等方面的说教，引诗达三十多处。其中多数的引诗，都是谈仁政、得民心和王天下的。这就足以说明他对诗的教育作用的重视了。

孟子为什么这样看重诗的作用？这同他要宣传自己的政治和思想方面的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明确地表示，他对战国中期那种在他看来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和“孔子之道不著”（《滕文公下》）的局面深为忧虑。于是他提出“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的主张，企图以孔子的那套东西和他自己的“仁政”、“性善”等主张为思想武器，整治春秋以后日渐崩溃的礼乐伦常和社会秩序。孟子注重发挥诗的教育作用，也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的实现。但是，春秋以来社会的急剧变革，领主阶级的内部矛盾，领主阶级的逐渐没落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得势，地主阶级政权之间以及他们

同领主阶级政权之间的攻伐兼并，人民同统治阶级的矛盾斗争，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孟子不可能正确认识历史的进程和产生这些矛盾斗争的根本原因。他的思想比较保守。他只能用端正人心的办法来解决这些社会矛盾。这无疑是本末倒置的。事实证明，现实发生的这些变革，包括诸侯放恣，处士横议以及被孟子认为的种种“波行淫辞”，都不是孔孟的思想能够约束得住的。所以孟子的说教就显得空洞和无济于事。尽管他十分真诚地重视发挥诗的教育作用，但是客观的现实却使他难以收到如期的效果。这是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注重诗的功用的看法也并非毫无价值。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尽心上》）他说仁德的话不如仁德的音乐深入人心。这里说的是艺术的教育作用；他又说实行良好的政治措施不如实行良好的教育能够得到民心。这里就包括了诗的教育作用在内。他认为如果统治者把教育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就会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护。孟子的这些看法，一般地说，是他给统治者提供的统治经验；特殊地说，他能够从诸种教育形式的比较中，把音乐、诗歌等教育形式在陶冶人心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特殊功效，给予理论观点上的概括。这是孟子对前人这个方面观点的一个新的发挥。

二

孟子显然继承了孔子论诗的思想。但是，孔子与孟子论诗的侧重点却各不相同。孔子论诗，侧重于诗的社会功用；

而孟子论诗，则侧重于诗的思想内容的理解。这是孟子论诗的一个特点，也是他发展孔子文学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

对于一首诗的思想，如何才能理解它，孟子有自己的看法。他的弟子咸丘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舜的父亲——作者注）之非臣，如何？”孟子回答说：“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上》）孟子的这段话，在诗的思想内容的理解方面，表明了这样两点看法：

一点是，“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就是说，在理解诗的思想内容的时候，不要因为拘泥文字而伤害了词句，也不要因为拘泥词句而伤害了诗的原意。孟子认为，对于咸丘蒙谈到的《诗经·小雅·北山》一诗思想内容的理解，不能孤立地抓住那四句，就说它所表达的意思同舜作天子，瞽瞍却不是臣民相矛盾。因为《北山》所表达的不是那个意思，《北山》的意思是说作者为国事而辛劳，甚至不能奉养他的父母。这是孟子的看法。其实，《北山》所表述的内容，也不就象孟子所说的那样。《北山》揭露了幽王时期大夫劳逸不均和幽王善恶不分的情景，表达了作者对这种现实的愤慨不平的情绪。所以对于这首诗的思想内容的理解，我们同孟子的看法就不完全相同了。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孟子在这里表明了反对抓住只言片语，伤害诗的原意（孟子理解的具体诗篇的原意正确与否

是另一个问题)的看法。孟子还举出《大雅·云汉》的例子,也来说明这个问题。

再一点是,“以意逆志”。就是说,在理解诗的思想内容的时候,读诗的人便要用自己的感受去探求作品的思想。他对《北山》的理解是一个例子。我们还可以从他同梁惠王、齐宣王以及同他的弟子其他一些引诗为证的谈话中,了解到他的这个方面的意见。如他的弟子公孙丑对他说:“高子曰:《小弁》(见《诗经·小雅》——作者注),小人之诗也。”孟子说:“何以言之?”公孙丑说:“怨。”孟子说:“固哉,高叟之为诗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夫,高叟之为诗也!”公孙丑又问:“《凯风》(见《诗经·邶风》——作者注)何以不怨?”孟子说:“《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告子下》)从孟子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他的这样两个方面的观点:一是,反对高叟那样刻板地解诗方法。他认为高叟死死地扣住《小弁》的抱怨之情,就说它是小人之诗,是不对的。因为高叟仅仅从诗本身所反映出来的某些思想出发,这还不能使诗的思想得到一个正确地解释;二是,强调读诗的人要有一个恰当的观点,他才会以自己对诗的感受,即用“意”去探求诗所具有的思想。在孟子看来,读《小弁》和《凯风》这样的诗,没有“亲亲”和孝顺的感受,就不能很好地探求出这两首诗的思想。孟子这里显然是把“意”,看作是“以意逆志”的关键,从而紧紧地把握住解诗的倾向性。这种解诗方法,其实就是把封建统治者

长期以来说诗用诗，实行诗教的经验，运用到诗的内容的理解上。孟子在诗的内容理解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发前人所未发。从这个方面来说，孟子对文学问题的认识，显然比孔子进了一步。

“以意逆志”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在文学批评，乃至文学欣赏上，都有它的普遍意义。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人们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思想总是要被打上阶级的烙印的。对于任何一首诗和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都不会和人们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无关。因此，可以说，人们批评或欣赏文学作品，也无不是在程度不同地“以意逆志”。恰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鲁迅全集》，五卷，《批评家的批评家》）因此，我们只能说孟子是在封建主义的圈子之内，来谈“以意逆志”的。但是，他的这一观点的普遍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同时，孟子的这一观点，也隐约地体现出他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诗的文学特征。在他看来，“言志”的诗，只有“以意”去“逆”，才能理解它。诗似乎隐含着一思想，有待读诗的人把它探求出来。而这种有待读诗人用自己的感受去探求它的思想的诗，同那些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需要人们“以意”去“逆”的一般说教文字，显然有区别。这种区别之点，尽管孟子在道理上并未明白地说出，但是他在实际上已经表露了他所感受到的这种情况。从而在客观上给人们提供了诗所具有的，至少在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方面具有

的语言凝炼，形象含蓄等文学表现上的特征。

尽管如此，“以意逆志”这一理论观点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既然主张用“意”去“逆”，就难免产生附会的东西。事实上，孟子对诗的解释，是颇具孔门说诗的特点的。他常常为了达到教化的目的，穿凿附会。如他的弟子公孙丑问他：“《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他回答说：“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尽心上》）孟子这里的解说完全是曲解和附会。“不素餐兮”，是《伐檀》中的诗句。《伐檀》一诗写的是劳动者被迫伐木，给领主制造车辆时的感受，表现劳动者对寄生的剥削者的愤慨和不平。“不素餐兮”，表达的是劳动者对剥削者的讽刺和轻蔑。但是孟子却把这句诗解释成君子得到国君的任用，安富尊荣，又能孝亲敬长，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这是再好不过的了。换言之君子本来就是不种田的，做到这种程度就是很值得称道的了。显然孟子这里的说诗，同诗的原义风马牛不相及。虽然说这是孟子对某些诗句的利用和解释，但是也未尝不能看出他在“以意逆志”过程中的阶级偏见和形而上学的主观色彩。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如他说服齐宣王“好货”，引《公刘》中的诗句（《梁惠王下》）；说服齐宣王的“好色”，引《邶风》中的诗句（同上）；对滕文公讲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关心百姓的时候，引《七月》中的诗句等。对于这些引诗，我们似乎不好把它们被引用时所表达的思想，就看成是孟子对整篇诗的思想内容的理解。但是只要看一下孟子对《北山》某些诗句的解释和他对《北山》整篇思想的理解所反映出来的观点上的一致性，就会感到，

既或在他引诗的问题上，也可以看出他的“以意逆志”的观点的弊病。

对于怎样理解诗以及一些著作的思想内容，孟子还提出另一个看法，就是“知其人”。孟子对他的弟子万章说：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孟子这里本来说的是道德修养问题，是说同现实的“善士”和“古之人”交朋友的事。但是其中说到，学习诗歌和一些著作，就要了解它的作者；要了解作者，还要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所以，“知其人”，这是孟子提出的理解作品的又一个重要方法。

有的文学批评史，把孟子提出的“知其人”与“论其世”的观点，统统说成是孟子提出的考察作品的方法。这种说法实不确切。说孟子提出要正确理解作品的内容，就要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这样的方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他提出要正确理解作品的内容，还要了解作者的时代这个问题，就不太符合孟子的思想实际了。因为第一，孟子所说的“论其世”，并不是指理解诗歌和著作的思想而言。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怎样才能知其人呢？他说：“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可见“论其世”的目的还在“知其人”，同古人交朋友。当然，因为要“知其人”而“论其世”，同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毕竟是间接的。因此，把它直接说成是孟子提出来的考察作品的方法，显然不是孟子的原意；第二，孟子并不认为考察作者所处

的时代如何，对理解诗歌的思想内容是必须的。孟子在引用《鸛鸣》和《蒸民》的诗句时，两次都引用了孔子的“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这句话，表明孟子认为诗歌就是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道理的；他提出“以意逆志”的理解诗的看法，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同他的弟子讨论了一些诗的思想如何理解的问题，包括《小弁》和《凯风》在内，也都没有涉及到什么“论其世”的思想。

但是，仅就孟子提出的“知其人”的方法来说，它在文学理论领域所具有的价值也就十分重要了。这一理解作品的方法同孟子提出的其它方法，尤其是同“以意逆志”的方法，应该说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尽管孟子并没从文字上说明这种联系，事实上他已经表明了这种联系，即“颂其诗”便应当“知其人”，“知其人”就要“论其世”，这样才有利于作品的理解，有利于“以意逆志”。这是孟子在如何理解作品的问题上，给我们揭示的了解作者同理解作品之间的重要联系。这在先秦的文学理论领域，是一个新的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自觉地把作品的思想内容，同它反映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他所谓的“论其世”，同我们所说的讨论作品的时代背景，还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他所谓的“论其世”是指我们所说的作品的时代背景而言，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孟子认识到了文学作品是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东西，或间接地表述出了类似这样认识的文学观点。他当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把“论其世”的看法还仅仅局限在“知其人”的范围之内。就说明他并没有自觉地从理论上把文学作品真正当作文学作品来看，致于时而便把诗歌同其它非文学作品的东西一样作为一般的教育材料来对待。

这是完全合乎孟子的思想实际的。

三

孟子对于言辞的运用，很有一些看法。他认为思想是对言辞的运用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他说：“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公孙丑上》）孟子这里同意告子这样一种观点，即不能在思想上有所得，就不要求助于意气；但是，他不同意告子这样一种观点，即不能在言辞上有所得，就不要求助于思想。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思想与言辞的关系上，孟子认为思想是根本。言辞表达方面有了问题，不从思想上求得解决是不行的。

因此，他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对言辞运用的意义。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他不仅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并且他还善于依据自己的这种修养，来判断人们言辞的是非。他的“浩然之气”到底指的是什么？他把它说成是一种“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的“气”（同上）。这就说得玄奥神秘了。其实也无非就是一种道德的信念和精神罢了。当然，孟子的这个“浩然之气”有它的封建主义内容。孟子表明他就是依据自己这种道德修养而“知言”的，即“谗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同上）反之，依据孟子的看法，人们从言辞的种种情况上，又可以发现“养气”上的差异。这就是孟子给人们提供出来的“养气”与“知

言”的看法，表明道德修养对言辞的运用具有制约的作用。这是孟子对孔子“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的思想一个新的扩展。

在言辞的具体运用上，他提出这样两点看法：一是，主张言辞要诚信。他说：“言无实不祥。”（《离娄下》）又说：“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尽心下》）在孟子看来言辞要诚信，目的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故意使人知道自己的行为端正，而是说诚信的言辞，正是自己德行修养的真实的表现。这固然是讲道德修养，但也是在讲言辞的运用；二是，主张“言近指远”。他说：“言近而指远，善言也。”

（同上）在他看来，言辞浅显而含义深刻的话，就是善言。他还认为，君子说出的话，当是通俗、常见的，但是一些仁义礼智方面深刻的道理就在其中。所以，孟子便很注意使用那种思想政治倾向比较鲜明，而又易于被人们接受的言辞。如他说，汤行仁政以七十里王天下，“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梁惠王下》）“仁之胜不仁，犹水胜火。”

（《告子上》）“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离娄上》）等等。可以看出他在语言的表达上，实际强调的是倾向鲜明，言之有物，深入浅出，具有一定的形象性。应该说，孟子在言辞运用方面的主张和实践，给后代散文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四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孟子的文学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他的文学思想，并未形成自觉的理论体系；但是，它却表明了孟子对一些重要的文学问题的看法。我们知道，孟子显然没有谈到过“文学”这个词。他只谈到过“文”这个词。他所说的“文”，主要包括的内容是：1、指文字而言。如“不以文害辞”（《万章上》）的“文”；2、指文辞而言。如“其文则史”（《离娄下》）的“文”；3、指文饰而言。如“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离娄上》）的“文”。可见孟子的“文”，并未包涵文学作品在内，同孔子的“文”包括文学作品在内不同。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妨碍孟子对一些文学问题发表看法。如，对诗的教育作用，对诗的内容如何理解等问题的看法。而且有的看法又是前所未有的。尽管这些看法还是零散的，简单的，甚至是粗糙的。但是，这些问题，却是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经常涉及到的内容。孟子的这些看法，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文学问题的一些认识，反映了他们对前代文学思想的继承，以及他们在当时所能提供的新东西。从而使他的一些文学理论观点，成为我国古代早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

二、他的文学思想，是对孔子文学思想的一个发展。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早重视文学批评并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从文学观点上来说，孔子对诗文的社會功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语言运用等问题的阐述和对《诗》三百的评价，都是他在前代诗文写作实践和人们逐渐积累起来的对文学问题看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文学问题认识的一些情况。而孟子无疑是孔子文学主张的继承者。但是他对孔子的东西显然又有发展。这种发展集中

表现在他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其人”的观点上。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孔子是以自己对作品社会功用的直接表述和对某些作品的品评，启示人们接受作品的教育；而孟子则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定的理论观点，并且以此引导和要求人们按照他的观点去实行对作品的理解。这是孟子对孔子文学思想的深化。孟子为什么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些理论观点，并不奇怪。这同战国中期人们对文学方面一些问题认识的加深，同统治阶级统治经验的逐渐积累，希图切实地掌握文学和利用文学为巩固他们的统治服务是分不开的。这不能不是孟子对孔子文学思想有所发展和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他的文学思想，鲜明地体现出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目的性。严格地说，无论孔子，还是孟子，他们都不是把文学作品真正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的。孟子之所以重视一些文学现象，并对有关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其真正的目的也不外是为了增进贵族君子的修养和学识，或者给统治者提供一些统治经验罢了。未见他对文学本身许多问题的探讨有什么浓厚的兴趣。这样说，并不否认他给文学理论领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看法。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孟子“正人心，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辞”的责任和使命的增强，以及他对诗歌和音乐具有的感化人心的特殊功效认识得愈深，他的文学主张中的封建主义的东西也就越重。这就是孟子的文学思想，特别是他在阐发孔子某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学观点时，往往带有比孔子更为强烈的封建说教的原因，

孟子的文学思想对后代的影响比较大。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上。从一个方面来说，孟子把诗作为宣扬封建思想的教材，利用它来维护封建统治。孟子的这个思想，同孔子的这个思想一样，都不能不给后世的文学，从理论和实践上带来束缚；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究竟还是主张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的。这个思想又在客观上对后世的一些文学主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孔孟之后的《诗大序》和王充，曹丕，刘勰，直至白居易等，都十分重视文学（或谓“诗”、或谓“言”、或谓“文”）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强调发挥文学的教育作用。随着创作实践的发展，这种理论观点也在发展，并且逐渐丰富和明朗，越来越清楚地发展成为一种提倡反映现实，关心人民疾苦，揭露和讽刺时政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而孟子在这个方面对后代的影响，不应忽略。

二、在批评作品的方法上。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和“知其人”的理解作品的方法，其实也就成为批评作品的方法了。或者说，在批评作品的问题上，孟子阐明了读者、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孟子的贡献。尽管他谈到的“论其世”，指的并不是如我们现在所说的作品的时代背景，但是他显然说的是在“知其人”的问题上，“论其世”是必要的。这就不能不给人们理解作品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虽然间接但是必要的条件。致使后人便把“知其人”与“论其世”也都当成讨论作品思想内容不可缺少的条件了。孟子这一理论观点给人们的启示已经超过了他所论述的问题的范畴。清章学诚就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文史通义·内篇二·文德》）便是一个证明。“知其